

# 论宗族视阈下苏州府文氏家族及文学盛衰

刘志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明代文氏家族是苏州文化望族,以文徵明为代表,几乎每一代都产生出了杰出的文学和艺术人才。文氏子弟继承先志,通过不断编辑诗集和家谱,最后甚至培养出家族科举上最成功的人才——状元文震孟。然而本应该更加兴盛的文氏家族,却在明清易代之际迅速衰落。从宗族视阈来看,文氏家族始终未曾完成家庭组织化,从而也缺少抗拒时势波动的力量。文氏子弟的文人性格,也使其在利害抉择时不够沉稳,且容易有冲动冒险的倾向,这实际上给家族带来致命的打击。

【关键词】文氏家族; 文徵明; 文震孟;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96(2017)05-0066-12

## 一、苏州府文氏家族文人与文学概况

在苏州占籍的文氏第一代人是明代初期的文惠。文氏的祖先可以上溯到汉代曾任蜀地太守的文翁,五代后唐同光年间,文氏在文时的带领下迁居江西庐陵,是为庐陵一支。传十一世至宋代咸淳年间,宣教郎文宝,官衡州教授,子孙因家衡山,是为衡山一支。文宝五世孙俊卿,元代官居镇远大将军。洪武年间,俊卿六子以武臣子弟入侍明太祖为散骑舍人。后第三子定聪赘于浙江都指挥蔡本,随蔡入苏,又随蔡入杭。而定聪第二子惠,赘于苏州张声远氏,因留居吴门。居所在苏州长洲县德庆桥西北曹家巷。

徙苏之前,文氏以武职世其家。文惠居苏后,一则开设酒肆,进行商业经营;一则读书业儒,教授里中。文惠长子文洪(1426—1479),稍长时“家贫,市酒给养”<sup>[1](P.331)</sup>,却酷爱读书,文惠十分喜悦。“乃尽散市资,以佐学费”<sup>[1](P.332)</sup>,从学教谕龙游的舅氏张宗德,三年归吴为县学生。文洪读书刻苦,精通《易》学,科场却屡举屡北,中举时年已四十,直到五十岁方以举人身份授易州涑水县学教谕。任职三年后谢病归里,不久即卒。文洪是文氏家庭第一个立志以科举为出路的人,虽

然官微任短,但他的路径选择影响了文氏家族,为文氏家族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文人交游圈。王鏊说,文洪“古貌古心,清苦力学,尤深于《易》,吴下士多从之游,从游者多去为显宦。”<sup>[2](P.227)</sup>文徵明也说“吾文氏自衡山徙苏,家世武弁,我先大父讳洪始以文显。”<sup>[3](P.700)</sup>著有《括囊稿》,文肇祉《文氏家藏诗集》收其诗、文各一卷。

读书和科举是巨大而长期的教育投资,但在文洪这一代坚持了下来,立志把自己和子孙培养成成功的读书人。文氏初期本来家底甚薄,这一来就更要承受长期的贫困。据文林记载,直到文洪娶第三妻,还“时家屡空,太安人二姊皆嫁富家,而安人略不以壅盐为意。……养太安人十年余,然未尝一日尽肥甘之奉。”<sup>[4](P.357)</sup>事实上,文洪放弃从商后,只有靠教学维持家庭生活。文洪三子:林、森、彬,皆立志读书,菲薄的生活来源,无疑给这个读书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以至于文洪长子文林初任永嘉知县任上,因为俸钱未及时发放,居住条件恶劣,以至无力照顾妻、子,只好把孩子送到外父母家照顾。文林(1445—1499),成化八年壬辰科(1472)三甲六十八名进士,初任永嘉知县,“旌为浙令第一”<sup>[4](P.365)</sup>。丁父忧,居家三年。再

【收稿日期】2017-05-15

【作者简介】刘志强,男,河南商丘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起任博平县知县。成化二十年(1485)以绩召还,补南京太仆寺丞。弘治五年(1492)移疾归,于所居隙地建宅,名“停云馆”。弘治十年(1497)十一月,诏命以永嘉旧政起为温州知府。弘治十二年(1499)卒于任上。文林未享高寿,任知府以后的仕途是否更加通达,不得而知。但从任职经历来看,文林乃一员能官。永嘉、博平知县任上,注重教育和民生,考绩优秀。南京太仆寺丞任上,曾获朝廷的嘉奖。温州吏民因怀念为官卓有绩效的文林,交相推荐其为知府。一方面文林以其才干受到吏部掌典选的尹旻、吴宽等人的重视、鼓励和推荐,一方面在险恶的官场因为刚直招忌,遭到压抑和排挤,导致仕途不顺。文林还是文氏家族前期较为知名的诗人,他交游广泛,首先有吴中的名士、官绅,像吴宽、沈周、李应祜等乡贤,都是其终身的朋友。经常唱和的李东阳、吕秉之、杨循吉等,都是著名的文人。尽心接纳奖励的后辈,如唐寅、徐祜卿等,都是一时风云的才子。更重要的是,文林的交游圈,与其子文徵明的高度重合,有时文林有意让文徵明去跟从自己诗、书、画成就突出的朋友学习。文氏得以渐渐享名吴中,可以说是文林父子共同的经营成就。在家庭方面,文林南京寺丞辞职后,在家筑停云馆,过着诗酒吟咏的生活。此时的文氏除基本生活和教育投资外,可能已经积累一些财产。此外,文林有北庄一所,是不是像吴宽家庭著名的东庄一样,缺乏相关资料,尚不能断定。根据文林的描述,大致可推知北庄既是游赏之地,又有田可种、有鱼可钓,而且这种田庄生活令文林十分流连。文林首次编有迁苏之后的文氏族谱《衡山新谱》。永嘉知县期间,推行乡约,刊刻族范,敦行教化的思想和做法,势必也对文氏家族造成影响。文林诗文著作丰富,存著有《文温州集》十二卷。另有笔记小说《琅琊漫抄》一卷。

文森(1464—1525),文林弟。成化丁未(1487)三甲四十三名进士。初任庆云县知县,再任郟城县知县。召拜浙江道监察御史,陞南京太仆寺少卿,诰授中宪大夫,寻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德十二年(1517)致仕。嘉靖四年(1525)卒于家。文森与其兄文林虽同是进士出身,年龄却相差19岁。文森读书时非常刻苦自叙,“读书终夜不成眠”<sup>[5]</sup>,同时文林在读书方面给予过文森诸多指导和帮助。两人都有长期中下层官职任职经历,虽然渐次以考绩得到较高官职,但都时间不

长,文林在知府任上仅一年有余,文森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后,当年就乞病回乡,不再任职。总的来说,兄弟两人没有打下稳定的高级官僚家庭基础。文森的宅第在德庆桥南,与文洪、文林宅相邻,与其子文斗舍宅建文天祥忠烈祠。文森“自少贫苦,然视富贵,漠然无所动于中。既贵,不复殖产,亦不治居第。俸禄所入,皆缘手散去,家之有无一不问。至于子女婚嫁,特成礼而已,不求备也。”<sup>[6]</sup>文林主要给家人起到人格和事业上的表率作用,但对文氏家庭发展的物质方面帮助不大。文森对其弟文彬备极友爱,对其侄文徵明也悉心教导。《文氏家藏诗集》收其《文中丞诗》一卷。文森喜白居易,诗作风格也与白相似。

文徵明(1470—1559),文林之次子,文森之侄。文徵明是文氏家族艺术成就上的巅峰人物,也是吴风雅文化的结晶。文徵明的魅力,代表着吴文化的魅力。他得益于吴文化的滋养,对吴文化有巨大贡献,他的影响不但超越了地域,甚至超越了国界。文徵明的教育,自小得天独厚,除了父亲,母亲也能诗善画。文林除亲自指导外,往往把文徵明托付给自己能力突出的朋友。“于文师故吴少宰宽,于书师故李太仆应祜,于画师故沈周先生。”<sup>[7]</sup>(P.3924)这些都是吴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文徵明由此不但得到艺术能力、人格修养方面的提高,也得到进入苏州上层主要缙绅交际圈的资格。文徵明遇到唐寅、祝允明等人后,共同倡导古文辞写作。古文辞是对时文主流的物极而反,他们倒也不在恢复文以载道的传统,而是可以借此更自由的驰骋自身的才华,摆脱时文写作的拘束和痛苦。但实际上,古文辞的写作因颇有轻浮者的参与,颇受官方的抑制和打击。而文徵明最终的出路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过多的兴趣、交游和书画创作无疑分散了锤炼时文的时间,结果经过二十七年的时间,九次乡试,竟然未能中举。文徵明最后一次乡试已五十三岁,经历确实值得怜悯,然而也不能不说与其兴趣过多而广有着关系。

嘉靖元年,文徵明仕途发生转折是年,文林故交林俊起工部尚书,过吴,与徵明一见如故,遂修书荐徵明于工部尚书李充嗣,谓“文徵明奔父丧,却贖金,金几千许。宁庶人屡召不起,气节有如此者,其温粹之养、介特之行、深博之学、精妙之笔法,皆眼中所少,一书生名动天下,苏人以为星凤。”<sup>[8]</sup>次年,李充嗣荐徵明于朝,徵明得以岁试谒吏部试,授翰林待诏。文徵明由此在京城当了三

年的从九品小官。一方面,京城集中了大明帝国最多的科举精英,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名动天下的文徵明成为他们争相结交的对象,这是文徵明也是以其为代表的吴中士人的荣耀。一方面,经过亲身体验官场的险恶与屈辱,文徵明很快对其流露出失望、痛苦与消极的态度,打算做隐居的陶渊明,坚决上疏求归。得到允许后,遂结束了此生仅仅三年的官场生涯,回到了吴中。文徵明从此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不用再应付噩梦般轮回的科举考试,不用再在功名与兴趣之间矛盾与挣扎,在自己早已习惯的风雅圈子里,不再试图冲出,也不需要冲出,一心进行艺术创作,以后他成了吴中艺坛的领袖、青年后辈的导师。他创作的书画,都为人们珍惜和争抢。他不想做的,就可以不去做;想拒绝的人,就可以拒绝。在九十岁高龄去世前还在进行最后的创作,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完满的句号。

按文嘉为其父作的行状,文徵明一生沉迷于艺术和精神世界,不问家人生产。实际上,这是对士大夫高洁风格方法上的有意塑造,家族之生计与维持是作为一家之主的文徵明不可推卸的责任。文林去世时,文徵明三十岁。其兄文奎大徵明一岁,县庠生,脾气暴躁,没有特别突出的能力,在文林死后不久与文徵明分家。分家意味着对既有财产的争夺,也表示不信任兄弟团结能够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文徵明描述分家之后的状况是“既立门户,遂有食指之忧。僮仆单鲜,且须薄植生事。”<sup>[6] [P. 1378]</sup>其后,文氏家庭的生计来源主要是书、画创作,长期的贫穷一度到了借米度日的地步<sup>[3] [P. 210]</sup>。在京城做官时,他已近六十岁,尽管是知名人物,生活上却实是不易。买马差不多花去了仅有的财产,租房以及其他费用就已不知“何所从出”<sup>[6] [P. 1681]</sup>。文徵明之所以坚决辞职,京城生活艰难的经济方面恐怕也是一大原因。归乡后的文徵明有多重身份,家族人丁日盛,文徵明是家庭之家长和教育者;对苏州来说,文徵明是吴中德望俱著的士绅和名满天下的艺术家;而其自我期许,又是纯粹的文人。文徵明归乡后家庭有所扩建,除原先拆除又重建的停云馆,又“筑室于舍东,名玉磬山房。树两桐于庭,日徘徊啸咏其中。”<sup>[6] [P. 1725]</sup>至此,文徵明家庭大致规模已有“停云馆三楹,前一璧山,大梧一枝,后竹百余竿,晤言室在东,中有玉兰堂、玉磬山房、歌斯楼。”<sup>[9]</sup>此时的文徵明才有条件专心于艺术创作,不必过问家

人生产,尽管创作很可能仍是文氏家族的主要收入来源。文家的生计、经营,由文徵明妻子吴氏负责,“凡两更三年之丧,及子女婚嫁,筑室置产,毫发不以干公之虑。”<sup>[6] [P. 1727]</sup>由此可见,文家生活来源除文徵明通过创作提供以外,可能已慢慢增置了较多的田产。尤其是文彭、文嘉长大以后,同样精通书画创作,并以此获得收入,在生活方面,达到文氏家族前所未有的水平。文徵明九十而卒,据文嘉所作行状,徵明“子男三人,女二人;孙男五人,孙女四人;曾孙男女各四人;玄孙男女各二人。”<sup>[6] [P. 1681]</sup>五世同堂,人丁极一时之盛。尤为关键的是,家族之教育问题与作为家长的文徵明有密切关系,文徵明的兴趣、志向、特长等等都对家族成员发挥着重要影响。

文彭(1497—1573)、文嘉(1499—1582),分别是文徵明长子和次子。两人完全继承了文徵明的衣钵,甚至宦途不显的经历也相似。他们精于书画创作以及鉴赏、收藏,文徵明盛名在外,而求索书画诗文者甚众,结果往往就由二子代笔。很明显,此时的文氏家族已经形成一个以书画创作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无论如何标榜傲视权贵,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顾客消费和艺术商品市场。薛龙春说“明中叶的苏州文氏家族,尤其是文徵明与文彭、文嘉父子,投身于最为繁忙的应酬活动之中。与单一的书画应酬不同,他们还需要回应客户的其他文化索求,诸如诗文、鉴定题跋、全补古画、统筹碑板、钩摹刻帖、篆刻,甚至统筹当地文人为某一特定功能创作整套书画卷册。”<sup>[10]</sup>文氏父子是艺术品方面的专家和权威,数代人参与优秀艺术作品的生产和创作,足以使文氏家族及其周围成为艺术品流通的中心。文氏创作或鉴定过的作品,不但在吴中,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都有广阔的市场。除此之外,在市场作用下,相应产生了一个以门生、姻亲、朋友甚至邻居为中心的中介机构,需要中介的原因,或者是为催促文氏尽快完成作品,或为被文氏拒绝的人们的辗转托付,终归有助于文氏艺术商品的生产。活跃的市场交易,无疑有也助于文氏家族名声和财富的积累。

文氏家族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可以从文彭之子文肇祉、文元发,文嘉之子文元善身上体现出来。文肇祉(1520—?) 在仕途上仅短暂地做过上林苑录事,但生活上的优裕已经远远超过前代。“文肇祉回乡后于虎丘南岸结庐,初名海涌山庄,因凿池而虎丘塔影见,因改名塔影园。”“他不仅可以在

虎丘山下辟园自居,还拥有多处住宅和田产,除了在郡城的停云馆祖宅以外,还有‘绿苻村庄’、‘射泾田舍’等。”<sup>[11]</sup>文肇祉对家族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收集和整理文集和家谱。“万历十六年(1588),文肇祉编纂刻印了《文氏家藏诗集》,收录自其高祖文洪至其弟元发的文氏族人诗集八种共十八卷,又编辑了《家藏诗集》的缩编本,选文洪、文徵明、文彭、文嘉和自己的诗作十四卷,合编为《文氏五家集》。另外他还编纂了文氏家谱性质的《雁门家乘》和《文氏族谱续集》。”<sup>[11]</sup>文元发(1529—1602),弱冠入府学,“滞场屋者垂三十年”<sup>[12]</sup>,直到五十岁的时候,才在其好友申时行的帮助下,谒选得浦江令。在任五年,升河南卫辉府同知,未就,以病乞致仕归。文元发自言“今幸藉先人遗泽,得免负戴,有田三百亩,足以供朝夕,草堂一区,岁时伏腊,烹鸡刍酒,足以备祭祀。……居士归,旋葺其旧居,颜其堂曰愿贤,寝曰语安,筑小楼一楹曰心远,日坐其间,读书课子,间吟小诗。”<sup>[12]</sup>凭借家庭的积累,文元发不但可以轻松负担子女教育,而且可以保证自己悠闲的生活。文元发和文肇祉都是申时行的好友,得到申时行的帮助,但这在兄弟俩的心中,既是感激的,又是惭愧的。文元发不愿意继续靠与申时行的关系升官,恐怕是与自己的文人性格太过冲突有关。文元发对其子文震孟一辈人的教育极其严厉,这其中恐怕有自身科举的阴影和对科举成功的渴望。文元发不同于文氏族人的一点在于交友的选择也非常严格,更多的时间是读书、创作,所以作品丰富:著有《学圃斋随笔》五十卷、《兰雪斋集》二卷、《清凉居士集》二十卷,另有《文奉议集》。在书画艺术上,文肇祉、文元发兄弟无法越过父、祖的高峰,而他们又是父、祖家族积累的受益者,他们自己在科举上算不上成功,因此望子成龙对族中子弟们施加严厉的教育,表明一种希望振兴家族的心理。

文震孟(1574—1636),天启二年(1622)中状元,时年四十九。尽管他与曾祖文徵明同样经历过反复考试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最终的科举成功还是为自己和文氏家族赢得无论在吴中还是全国都称得上是巨大的荣耀。文氏家族科举上的成就至此也达到顶峰。但文震孟面对的问题是,大明朝廷逐渐走上了末路,越来越严重的内忧外患加剧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文震孟作为带有状元光环的重要人物,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置身事外,况且其初入政坛,正是热血沸腾、期于有为

的时候。文震孟居官期间,前有魏忠贤擅权,屡屡凶险。后为权臣所陷、阁臣所忌,饱受排挤。官场的激烈斗争是国家艰难形势的反映,文震孟的个人遭遇是官场险恶形势的反映。为文震孟写墓志铭的徐枋说“举一人而天下悦”,“悦”是一个可以深味的词,表示在国事日非之际,被人寄以很大希望。但有人悦,就有人不悦。且“不悦”的势力盘根错节已久,根本深厚,绝不是轻易可以撼动的。导致文震孟“通籍十五年,而前后立朝不满三载,天下惜之。”<sup>[13]</sup>(P.250)虽然震孟“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但限于资历浅、经验少、人脉资源积累不足等情况,实际上在官场自身难保,更不要说有所补救了。最终,作为内阁辅臣的文震孟与首辅温体仁因许誉卿、申绍芳营求美官事发生矛盾,因出言不慎,被温体仁抓住把柄上告,遂落职闲住。文震孟生活、为官在“干戈遍于海内,水火角于朝端”的乱世,既不能得到朝廷的信任,也不能有大的作为,这是文震孟的不幸,可以说也是文氏家族的不幸,使家族最终没有足够权威的人才维持,遭受到比较大的外来打击后便很快全面衰落下去。文震孟有园林药圃,即今艺圃的前身,当时即是苏州城名胜,药圃“中有生云墅、世纶堂,堂前广庭,庭前大池五亩许,池南垒石为五老峰,高二丈,池中有六角亭名浴碧。堂之右为清瑶屿,庭植五柳,大可数围,尚有猛省斋、石经堂、凝远斋、岩扉。”<sup>[9]</sup>如此优雅的生活环境,无疑是后期文氏家族生活优裕的证明。文震孟在科举和仕途上都曾走得很远,这也使文震孟的文学思想有了不同以往文氏文人的新的特征。世人对苏州以及苏人的观感,大多以柔脆、浮薄等等目之,这引起文震孟的不满,特作《姑苏名贤小记》,选取人物“大要以刚劲为主,即过中者必记,一破软美之诮也。清修苦节,虽微必记,不清苦即不能刚且劲也。”其目的不只是反驳、反思世俗的看法,也是对自己和苏人的鼓励和期望,“欲使四方之士知吾苏之为苏意者如此也。且令吾苏之士揽先贤之遗风而兴起焉,洒濯磨砺,毋甘为当世所轻。”<sup>[14]</sup>同样的眼光,也体现在艺术欣赏上,如评赵孟頫书法,“赵书为艺林所珍,然余每观其笔,微其人之无骨,滑如脂,膩如油,宁不能作一字,不可似渠一笔。余每举以示人,人皆谓余腐且偏也。”<sup>[15]</sup>(P.642)与其曾祖文徵明对赵的推崇截然不同,这显然已经不是纯粹的艺术欣赏,乃是把过于强烈的人格精神投射到艺术活动中去,因不满其人,遂不满其作品。文震孟主要的诗文著

作,主要保存在《药圃文集》《药圃诗稿》。写于药圃的作品,似乎不再是那个激烈亢直的政治家,而是宁静淡泊、知足常乐的隐士。按文震孟自己的说法,这是“生平命骨”<sup>[6] (P.192)</sup>如此,也就是自己终归是吴地风雅的继承人。

文氏家族最后的艺术高峰人物是文震亨(1585—1645),著有风雅教科书《长物志》,他无论在交游上,还是在仕途上,都以擅长风雅闻名,这无疑得益于家族传承。文震亨家庭生活相当优越,天启四年(1624)应天乡试下第,“即弃科举,清言作达,选声伎、调丝竹,日游佳山水间。”<sup>[17] (P.22)</sup>更能以自己的理想构园以居,“公(震亨)长身玉立,善自标置,所至必窗明几净,扫地焚香,所居香草坵水木清华,房栊窈窕,闾阖中称名胜地。曾于西郊构碧浪园,南郊置水嬉堂,皆位置精洁,人在画图。致仕归于东郊水边林下经营竹篱茅舍。”<sup>[18]</sup>其中的香草坵尤其是四方之士过从游赏之地,“香草坵在石马泾西高师巷,文中书震亨即冯氏废圃以构,中有四婣娟堂、绣铗堂、笼鹅阁、斜月廊、众香廊、啸台、玉局斋,乔柯奇石,方池曲沼,鹤栖鹿柴,鱼床燕幕,以至纤筠弱草,盎峰盆卉,无不被以嘉名,侈为胜事。”<sup>[19] (P.100)</sup>文震亨凭借自身之品味和家庭之财力,文氏园林建设以此极一时之盛,这一方面是财富消费行为,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扩大影响力。可以说,文震孟兄弟无论在科举、交游或者家族实力方面都胜过以前的文氏。在个人成就上,尽管文徵明是无法超越的高峰,总体实力上,却是文震孟兄弟后来居上。如果假以时日,文氏家族进而建设更加组织化的家族,使文氏族人联系更加紧密、发展更加均衡、管理更加制度化,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文震亨的死是文氏家族衰落的开始,家国之变至少是其死亡的一个促因。一六四四年,崇祯死,建州女真在北京称帝,国号清。一六四五年五月十五日,清军和平进入南京。同年六月初四日,清军兵临苏州。准确地说,清军在苏州遭遇过零星的抵挡和混乱的秩序,然而抵挡皆不是正规化军队,混乱的因素包括叛仆攻击富室问题,不全是针对清军,而清军恰恰发挥的是稳定秩序的作用。在此秩序重建的形势下,清军戒备森严,防范可能产生的一切混乱,是必要的,也是头等大事。苏州世族受到清军的密切注意,原因也是只有世族有能力参与领导反抗。而世族也显然清楚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表率作用,以及取何种策略可以继续

保持自己之声名及地位。清兵进入苏州后,文震亨避地阳澄湖滨,于一六四五年闰六月二十九日“呕血数日卒”<sup>[17] (P.22)</sup>。此时的文氏,无疑损失了一位决定家族未来走向的关键人物。文秉(1618—1646),文震孟次子,因牵连抗清义军,被杀,家产充没。另一文氏子弟,受牵连,杖毙。其他族人,幸而未被牵连,也已惶惶不可终日。文秉(1609—1669),文震孟长子,在家难之时,把家中收藏、法书名画等等寄放在至戚家中,但是寄托非人,悉皆沉没。文秉受此打击,穷愁潦倒,“幸得脱兵刃间,意颇不自聊,乃挈其室,走庐文肃公墓下。”<sup>[20] (P.828)</sup>以遗民自居,专事著述。文元善子文从简,从简子文柁,“遭世变,隐于寒山之麓。”<sup>[21] (P.372)</sup>文柁亦有文名,然文从简死后,文柁“卜居北郊,遗迹池上,然几于无家矣,再迁停云,不两月而卒。”<sup>[22] (P.660)</sup>文震亨第二子文果出家为僧。其后的文氏族人,不但有名望者渐少,而且是赌博荡产,或是赘入他家,家族彻底衰落下去。遽衰后,“族姓凋落,其存者饘粥不能继,皆糊口四方,稍知自守,以为难得。”<sup>[23]</sup>在清代重新编辑族谱,以为家族纪念的文含,叙述文氏家族后人的衰落现状时,心情无疑充满无奈、悲凉、痛苦:“中丞公一支:诸孙曾无一闻人,后止存一丁,伶仃孤苦,其绝立待。国博公长房一支:……迄今绝者什九,仅存季麟公后几人,前代风流渺矣。国博公次房一支:南云伯以诗文书画名家,建周伯亦不失先世遗范,万通侄能诗词,为诸生,鹿曹侄复以纂修得官,两任邑宰,惜皆不永年,今后人衰替,遂为三桓之子孙矣。和州公一支:……含不肖,因诸生中四十年,生五子,皆顽钝失学,今已丧其三。次房有三孙,又早孤。不肖难冀成立,呜呼,和州公之泽,于今五世矣,痛哉!中翰公一支:……嫡支仅存,无几危哉!”<sup>[23]</sup>

## 二、文氏家族与吴中其他宗族共同体的比较

何谓宗族?《白虎通义》云“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圣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礼大传》云:‘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注‘收族,序以昭穆也。’)《丧服·齐衰期》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云:‘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

也。大宗不可以绝。又‘世父母叔父母’，《传》云：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是皆通其有无，纪理族人也。”<sup>[24]</sup> (PP. 391 - 394)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相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sup>[24]</sup> (PP. 397 - 398) 因此所谓宗族，大意谓：所会聚在一起的、有共同尊奉对象的、既享受一定的权利又应尽一定义务的人们。会聚的方法是收族，收族的方法可以有多种，但要之是财产上互相帮助、精神上互相恩爱。《白虎通》是以儒家之思想总结以往之家族实际经验，为再造传统提供蓝本。按照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的“宗族”，自然趋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然后其他家族通过效仿和组织，渐渐普及到全社会，直至在全社会形成宗族之治，从而也使社会不再存在无以为生、无人过问无共同体的悲惨人们，这应该就是儒家的理想。《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却有意把大家拆成小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是为“农战”的需要，“农”者，耕地以提供赋税于战士，“战”者，通过战争开疆拓土以得到更多耕地。为把一切资源集中到“农战”中，既有各种各样的措施，又有总体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名为法家。《商君书》是法家思想的政策指导，很多方面与儒家思想是矛盾的，甚至专门针对儒家。在家庭建设方面，儒家主张合，合为宗族大家庭；而法家主张分，分为农耕小家庭。三五口的小家庭，在国家法律意义的正式称呼是：编户齐民，是历代王朝征收赋税的基础。后来的儒家往往感叹：世间已经无宗族，也无组织的方法。其实说的是法家思想占据优势地位，因此社会也完全小家庭化。儒家大师痛心于风俗、民德的败坏，呼吁重建宗法社会，体现在家庭方面，就是族共同体化。欲成功建设家族共同体，必须有“收族”的办法。经过程朱等儒学大师的倡导和实践，“收族”之法大致有三种：一，编撰族谱，以为确定族人地位的依据；二，建设宗祠，以祭祀追远思来、交流感情；三，设立义庄，以物质保障团结族人。所谓“教养”之法，有教有养，以树立人才。但真正建设起来的完备宗族共同体在宋元以及宋元以后的社会中属于少数，甚至在苏州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也属于少数。更多的是所谓家族，家族跟宗族的区别不在于规模大小、贫富强弱，而是有没有大致按照以上三点来进行共同体化组织，尤其是有无作

为家族物质基础的“义庄”，有则定义为组织化了的“宗族共同体”，无则泛称家族。本文以此为视角来观察文氏家族与其他宗族之异同。

族谱修撰方面。文氏家族的家谱修撰堪称丰富。居苏之第三代文林即撰《衡山新谱》，清初文点撰《文氏族谱》一册，清雍正时文含撰《文氏族谱续集》。“交木先生所成为衡山新谱，别于庐陵旧谱，自金紫公以下共八世，明占籍苏州之始也。南云先生所成为苏州新谱，较详于衡山新谱，自存心公以下共十一世，详苏州谱牒之盛也。书深所辑一准前人之旧，而于诰、敕、志、状、传、赞、述、略及哀词、寿序、诗篇，凡前谱所阙略者补之，生配、卒葬、冢墓、祠宇、第宅、坊表与夫选举、载籍，凡前谱所未录者增益之，而闺秀、方外亦得与焉。至是而文氏之谱灿然大备矣。”<sup>[9]</sup> 除此之外，尚不乏如文肇祉等热心编辑家族文献的人物。文肇祉编成《文氏家藏诗集》，收录文氏主要文人的主要著作，文从简刊刻《文氏宗支图》，文柟“辑制词、碑铭及历世所著诗歌，汇为《雁门家乘》”，皆为文点编辑《文氏族谱》奠定了基础<sup>[23]</sup>，也为文氏的繁盛提供了证明。但到民国十八年，彭谷孙为校刻《文氏族谱续集》时写序，云“十二世以下迄今又二百年，纘述未闻，久伤沦替，甚至松楸不守，祠墓无存，曲石阁揆纂《吴郡访古记》《虎阜金石录》，慨叹之余三致意焉。文氏浸衰，毋亦于父兄子弟仁义尊亲之训有所乖违而致此欤？栾郤之后降为皂隶，夫栾郤不足荣，皂隶不足辱，其所以荣辱我者，在此不在彼，其能食旧德、服先畴，盘根错节层累曲折以致之，典刑尚在，颠蹶犹兴，文氏勉之，天下后世凡为父兄子弟者共勉之。”<sup>[9]</sup> 由此可见，家族的衰落导致了各方面的普遍衰落，家谱编撰也就无从谈起。文氏家谱在兴盛期的编撰与宗族族谱编修大同小异。吴中范氏、王氏、申氏宗族，其族谱的丰富程度可能有些地方还不如以“文”闻名的文氏家族家谱。不同在于，宗族之族谱编撰，有一定的规定和要求，比如族中增添人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报告给族中相关人员备案；族谱应该多长时间续修一次，否则将被视作不孝等；尽管宗族不一定能完全按要求做，但既有此要求，久而久之，就能成为家族习惯法，对后代之行为既是压力也是促力。相反，文氏家谱的编写既没有规定什么人做，又没有规定以何种形式去做，编写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兴趣，采用的方法是事后搜访与整理，因此称不上完备之良法。文含编撰《文氏家谱续

集》之后,其他文氏家谱即已湮没无存。如果家族衰落期足够长,纵使后人有志编写,对以往族中之人口情况毫无头绪,结果只能放弃。而宗族共同体即使暂时衰落,只要基本的物质保障还在,登记人口工作有人管理,族谱的修撰就不至于完全中断。

宗祠祭祀方面。谱牒是对人的短暂而不清晰的记忆的替代,宗祠祭祀是对作为水源木本的祖先的尊重和怀念。现在的人是继承死去的人而来,如何对待死去的人,既关乎才能,又关乎德行。宗祠祭祀就是把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手段。作为子孙,是先人遗产、经验和传统的接受、继承和发展者,在祭祀中面对祖先时,是表示要做好接受和完成祖先心愿和理想的准备,无论是守成或是开拓,责任不可谓不大,所以祭祀一定是郑重的、肃穆的、真诚的、崇敬的,这种心情在祭祀中外化为具体的动作礼仪,反过来,又可以通过动作礼仪的练习来培养对祖先的肃穆恭敬之心。因此,宗祠祭祀,是所谓“教”,“教”的范围,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家庭,当然也可以是家族和宗族。“教”的目的,是要后人成材。“器必如礼,欲其因俎豆之数,而知有作圣之学焉;服必如礼,欲其因衣冠之制,而知有修容之学焉;登降裸献,则朝廷宗庙之事习焉;尊卑饮拜有序,则闺门孝睦之义著焉。”<sup>[25]</sup>

《礼记》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sup>[26]</sup>因此,有功劳于社稷国家的名公大臣往往有官方建祠祭祀。文天祥显系其人,苏州文氏自称乃文天祥裔胄,于是经文森倡,其“子斗,愿以其地作庙,世守其祀。巡按监察御史谢君琛以闻。诏可,赐其庙曰‘忠烈’。有司春秋飨祀如礼。”<sup>[27]</sup>文氏“忠烈庙”的建设,主要由文森一家落其事,官方予以认可。其后,文氏家族最有名的两位人物是文徵明与文震孟。地方上为乡邦贤人建祠纪念,此二人多被纪念对象。如五贤祠,祠文徵明、王守、汤珍、王宠、唐寅;景贤祠,祠吴宽、文徵明;三贤祠,祠文震孟、姚希孟、陈仁锡。文徵明、文震孟配享忠烈祠,已是康熙二十五年,似乎完全是政府决定,文氏族人不与。因此文氏家族之宗祠建设,多出于官方以及地方上对乡邦贤人的尊重和纪念展开,文氏族人似乎未有独立的、积极主动的宗祠建设。文氏族人知名者在有明一代的喜好是修筑园林,园

林同样是消耗财富的工程建设,需要金钱支出,金钱用于此而不用彼,故只能说文氏族人的选择如此,比较偏重于自身之文人趣味。官方建祠祭祀的人物往往也是家族的重要人物,家族独立为之立祠纪念,谓之家祠。家祠是全体族人共同祭祀之地。家庭祭祀则是在正寝之东,立祖先牌位,或祖先画像,祭高曾祖迹四代。文徵明为其兄文奎作墓志铭,云:“(文奎)居常严于事先,旦起,必衣冠谒先祠,非有故及疾病,未尝一日废。岁时祭享,必精必慎;遇时物必荐,或未荐,虽仓卒燕会,不辄入口。”<sup>[6]</sup>文元发自述云“今幸藉先人遗泽,得免负戴,有田三百亩,足以供朝夕,草堂一区,岁时伏腊,烹鸡刍酒,足以备祭祀。”<sup>[28]</sup>所指祭祀应皆是个人自发,至少不太可能超过家庭祭祀范围。对比范氏宗族共同体的宗祠建设以及祭祀规定,有个人化、简单化和全体化、规则化的区别。范氏宗族以纪念范仲淹为中心建设的祠堂群内容非常丰富,纪念范仲淹的祠堂,有官方设立,有宗族设立,也有学宫设立。祭祀时间上,仲春仲秋的上丁学宫祭祀,次丁官方祭祀,下丁宗族祭祀。在宗族方面,宗祠祭祀全体族人参加,祭祀对象、事前准备、事务负责、祭祀仪式等皆有具体的规定。范氏族人享有义庄所带来的权利,则也当应尽义庄所规定的义务,接受宗族的有目的的规训。范氏曾有记载,战乱之后“一旦会集于坟山,散亡之余,尚二千指。长幼聚拜,慈颜恭睦,皆若同居近属。”<sup>[29]</sup>则范氏宗族甚至经得住战乱的考验,而良好的家族效果,不得不归功于平日之规训。规训的成功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经验成为习惯,直到最后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所谓名门之后就是身份的标志,原因是他们本身就是门第的一部分。不得不说,文氏家族缺乏宗祠祭祀的规训,不曾背负对全体族人以(祭)礼为教的责任,当然也没有在平时以及经过衰亡之后揖让雍容的成就和收获。

义庄占据“教养”里面“养”的一部分,是宗族维持之根本物质基础,而一切祭祀、义宅、义学、工程建设等费用支出皆可由此而出。义庄与宗族人口之基本物质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劝惩制度亦寓于其中,宗族刚性规训的权威也来源于此。所谓刚性规训,是指以多给、少给、不给或者重给钱粮的方式鼓励、禁止或者不提倡族人的某些行为和做法。义庄规矩对族人是保护性的,是福利化的,也对族人形成压力和约束。宗族权威来源于宗族



“法律”的强制执行,“法律”是手段,其目的为宗族之利益、为“养”之恒久持续而已,使全体族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宗族,故收族之道,莫大于义庄。义庄的设立,最能体现有识之士睦族之用心。分居析产所导致的家庭涣散,非此不得以萃聚。义庄应据宗族之核心位置,谱牒编撰、宗祠祭祀等作为重要补充,以塑造人才,以敦睦亲戚,以强大宗族。但在宗法废坏的情况下,分析异居的小家庭倾向对家族或者宗族破坏性强大而持久,欲建设坚固的宗族共同体,关键还在于人才。倒不是说把分散的小家庭重新聚集在一起,同炊共居,就已经算是完成了建设。小家庭灵活而自由的好处,未可全非,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宗族共同体建设,小家庭还是分散的小家庭,只是通过共同利益、共同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作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合,使小家庭背后有强大的依托,这时的小家庭既是分散的又是统合的,既有灵活性,又得到宗族共同体给予的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保障。故宗族共同体建设需要能力大、眼光长远能够突破格局局限性而又能付出坚韧不拔努力的人完成。范仲淹在完成“万世睦族之良法”的义庄建设之前,心里默默地抱此想法已经二十年。申时行贵为状元和首辅,然而正式的申氏宗族共同体完成于其二子。王鏊家族乃洞庭东山富商,义庄建设经数代人的呼吁与筹措,方告完成。而文氏家族始终并无义庄设立,有明一代,文氏经过数代人积累,许多家庭如文肇祉、文元发、文元善等,都有相当规模的田产,他们各自经营,其收入也主要用于各自家庭的园林建设、教育投资等方面。也就是说,除了他们名望较大以及有功名在身可以免除一定的赋税外,与其他的小家庭或者编户齐民没有实质的区别。这种情况对于族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归有光曾以自家为例有过叙述“归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远流而未分,口多而心异。自吾祖及诸父而外,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于间。率百人而聚,无一人知学者。率十人而学,无一人知礼义者。贫穷而不知恤,顽钝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平时招呼友朋,或费千钱,而岁时荐祭,则计杪忽。俎豆壶觞,鲜或静嘉。诸子诸妇,班行少缀。乃有以戒宾之故,而改将事之期;出庖下之馐,以易新荐之品者,而归氏几于不祀矣。”<sup>[30]</sup> (P. 436) 归氏如此,文氏也可以于此想象。文氏作为“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的名族,不

乏名闻海内的人,不乏孝友忠厚的人,不乏热心编辑家族文献的人。然而对族中贫寒无名之家,常规性、制度化的赈济、馈赠,只能视为缺典。公平地说,文氏家族之名望靠着数代几个家庭的文人支撑,而每代也只不过一二实力家庭,而家族的综合实力,始终并不强大。

### 三、文氏家族及其文学兴盛与衰落之分析

无论家庭、家族与宗族的兴盛与衰落,无疑与起领袖作用的人才有着密切关系,兴盛时都少不了重要人物的出现,重要人物之志向和能力,往往影响甚至决定整个家族的走向和命运,当然,人物和家庭的命运也与时代、气运密切相关。如果把家庭、家族、宗族视作三个层次阶段,文氏达到了第二个层次,分析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的过程有价值,从更高的层次转而观察次级层级的不足,也有其意义。以下尝试把文氏家族及其命运放在宗族共同体视阈下进行一些观察和思考。

首先是人才。文徵明和文震孟是文氏家族的两座高峰。文徵明是家族的支柱,是乡邦的骄傲,深谙风雅的士大夫,无不视他为仰慕的对象。他既在艺术上领导和领袖潮流,又在德行上堪称榜样。高寿之年而卒,生前是家族三四代后人的养育、教导和栽培者。在主天下风雅的吴中,士大夫阶级能欣赏他,商人们欢迎他,就连底层人也能为其作中介而得到稍许的利益。他是吴中山水滋养出来的明星,也以自己的成就回报了这个城市。他的传承人除了子孙,还有众多的弟子,他们一起使吴中独特的书派、画派,影响更广、传世更久,文徵明注定和风雅苏州一起为后人铭记。在那个以科举、仕途为正途的时代,文徵明的父亲和叔父都是进士出身,对他来说,既是压力,也是鼓励。但文徵明科举之路实在与其声名太不相称,虽早已名满天下,但经过九次乡试,仍不能中举。最终“虚名”帮助了他,被举荐选贡,在京城当一个翰林待诏的九品小官。入仕之初的文徵明对未来不乏乐观和期望。但面对险恶的政治生态很快清醒了,无数的高级官僚在喜怒无常的朝廷中饱受屈辱,甚至随时有死亡的威胁,一个小小的九品京官又能有什么作为?况且又非正途出身,在京城文徵明固然有很多仰慕者,但同样,因为有求不遂或者对艺术抱有成见的人,对其流言诋毁,文徵明感受到的无疑是莫大的窘辱。于是,意冷心灰的文



徵明决定归去。当考满迁官,不肯往,对大僚的有意招致也表示拒绝。文徵明很快回乡了,他重新回到了他爱的生活中去,但他也放弃了更大的可能性。宗族共同体的层次高于纯血缘联系的家族,归乡意味着放弃与更多更高层次人物的交流,从而囿于自身之层次,无法向更高外迈进。文徵明到去世之前,无疑是家族的主翁、领袖、权威。但是,当次孙文元发被继母虐待时,文徵明做的只是“雪涕”抱怨。由此可以透露出在家族管理方面,第一没有严格遵循的家法,第二对家族贫苦之人也没有持续救济的机构。前者使家族的守法者得不到鼓励,而不良者也受不到惩罚,实质效果是进一步鼓励不良者试探底线。后者是使受虐待的文元发只能由文徵明亲自抚养,但如果进一步追问,如果有更多的文元发发生这种情况,文徵明又如何一一照顾?但同样,文徵明为文氏家族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们雅人深致、文质彬彬,是文徵明的助手和继承者。于是文氏族人一起在文徵明带领下,不但艺术创作丰富,而且以家族为中心,形成一个艺术产业链。使文氏家族稳居艺坛高位,名利兼收,加快家庭声名和财富之积累。

文震孟是继文徵明之后成就最高之人物。科举中状元,后又入阁为辅相,无论在科举还是仕途上,在文氏一族都是巅峰。如果天下太平,再加上仕途顺利的话,文震孟之名望可以给文氏家族带来更加不可限量的前途,可惜这两者皆没有。当时宦官与大臣如水火,党争又如水火,朝廷与满洲女真的战争更如水火。朝廷上下,家国内外,此时没有让人才从容展布的机会。大环境如此,而文震孟从政经验不足,激烈言论容易授人口实的个人因素也使其在仕途上处于下风,很容易沦为政争失败的一方。所以文震孟尽管通籍十五年,而立朝不满三年,入阁仅仅三月而罢,不久去世。文震孟未得大用,且去世较早,使文氏家族又一次失去跃升的机会。其生前维护家族已经颇历劫难,其弟文震亨直接卷入苏州反抗魏党使者的政治斗争,文震孟也被目为幕后指使人,杀身之祸将临,仅仅由于幸运,魏党及时倒台,才暂免于身难、家难。文震孟死后,文氏家族不再有足够权威的人物来领导家族,而此时内忧外患不断,家国之变近在眼前。根据经验,失去主要支柱,而又向来没有坚强组织的家族在变乱中所受的考验将会更大。

其次是人才之志。文氏族人对家族及自身命运的考虑,不会脱离时代和地域。大明王朝通过

一系列律法制度和道德的提倡,使统治下的人民各安其位。同时主要通过科举,给人才以机会实现由下到上有秩序的流动。为使秩序的安排具有权威性,惩罚和奖励的手段必不可少,施行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对其人民教育和规训的过程。有权力执行规训的人,是国家的管理者,管理者有着众多的名目,复杂的层次。但要之,国家要求管理者更精确地掌握国家的法律,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平,以为被管理者的表率。科举既是主要的“荣身之路”,文氏族人的意志和努力自然集中在这一方向。文氏数代族人投身于科举之路,有痛苦也有快乐,有失败也有荣耀。但总体上文氏家族越来越知名,跟科举上的成就密切相关。所受的教导和规训也让他们认为,有如此之荣耀不应忘记国家。在朝廷和法律禁止的事情上,文氏族人再三谨慎,通过实际行动和家庭教导务必使族人遵守不渝。比如,明律对“交结内侍官员”引发的犯罪处罚极重,于是文氏家族为避免麻烦,与内侍官员等的一切交往皆告断绝。文林、文森在仕途中,凡与内官有关的工作皆秉公处理,从而引起内官的忌恨。文徵明书画盛名之下,请托者众,但王府中人等皆绝之不与往还。且教导诸子曰“交结亲王,狎妓饮酒,律有明条,安可犯哉,汝其识之。”<sup>[6] (P. 1735)</sup>文震孟初入仕途即与魏忠贤党势与水火,后来更是几遭魏党毒手。初入阁之时,照例应往拜司礼监大珰,此时大珰曹化淳也雅慕震孟,而震孟竟不往,显然跟先人谨慎的家教有关。严厉的教育,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固然能够形成清白家风,然而有利于守成,却不利于开拓。文氏家族缺少家族组织化建设的努力,不特是物质上的积累较少,意志上、理论上的准备更加不足。

意志上的愿望与愿望不能满足之间,所形成的矛盾与张力,往往构成写作的内容和动力。这与“不平则鸣”与“志”的关系相类似,未满足其“志”,所以有不平之“鸣”音。“志”遇到的阻碍或挫折愈大愈久,则不平之“鸣”音亦愈高愈厚。科举成功,无疑是文氏全体族人之“志”,“志”之坚忍不拔者,如文徵明九次乡试、文震孟十次会试,皆是旷日持久的痛苦、磨砺过程,且看不到尽头,一次次的失败中,有痛苦、失望、消沉、怅惘、苦闷、忧愁、感慨、怀疑、自责、惊心、恐惧,也有振作、发奋、力争、希望与自我宽慰,这些真挚、深沉而复杂的感情发于中而形于外,为诗为文,构成诗文创作的一重要部分。与此相似的还有任官之后,官场的

拘缚,事务的劳顿,不情愿而又不得不尔的应酬,或者面对民生问题因官小位卑而感到的焦虑,足以占据人生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与悠闲与从容的文人趣味形成严重冲突和矛盾,从而构成写作内容的又一重要方面。比如文林,一生作为中小级官员浮沉官场,想离去,肩上背负责任。想好好干一场,又有很多无奈和不遂的追求,种种情感遂通过赋诗抒发出来,以中和无处不在的矛盾和两难,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而当文林真的归乡闲居时,诗歌创作的数量倒急剧降低<sup>[11]</sup>。文徵明虽然只在京城三年,期间的思乡之情便已不可抑制,诗中念念不忘家乡的石湖。由此可见京城生活的不得志。出处进退的矛盾构成文氏家族的重要写作内容,只有不断有人向上前进,总会产生无穷的感慨和人生矛盾,人生总有无奈的一面,得到的同时总有失去。然而对失去生活的感情和怀念却是充满诗意的。文氏家族的地位,是靠不断上进族人的不断争取,因此此种诗文写作实是文氏家族与时代、命运互动的证明。待到此种诗文不再出现,表示文氏家族开始走向平庸衰落,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文氏家族文学的另一大特征是“长物”文学。“长物”出《世说新语》王恭语“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意为多余之物。文震亨作《长物志》,“长物”指围绕园林建设的一系列文人清赏之物。清赏的对象包括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十二部分,《长物志》每部分一卷,共十二卷。沈春泽为《长物志》作序,云“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亨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sup>[31] [P. 10]</sup>说出了文人清赏与世俗的区别所在,文人自有其独特的认同标准,自成一世界。文震亨欲为此文人世界立法,成此集大成之作《长物志》。“予观启美是编,室庐有制,贵其爽而倩、古而洁也;花木、水石、禽鱼有经,贵其秀而远、宜而趣也;书画有目,贵其奇而逸、隽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也、简而裁、巧而自然也;衣饰有王、谢之风,舟车有武陵蜀道之想,蔬果有仙家瓜枣之味,香茗有荀令、玉川之

癖,贵其幽而闇、淡而可思也。法律指归,大都游戏点缀中一往删繁去奢之意存焉。岂唯庸奴、钝汉不能窥其崖略,即世有真韵致、真才情之士,角异猎奇,自不得不降心以奉启美为金汤,诚宇内一快书,而吾党一快事矣!”<sup>[31] [P. 11]</sup>文震亨的成就获得了文雅之士的肯定,证明文震亨所立之法确实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此书在明代出版时有诸名家审阅定稿,不但表示成书的郑重,也表示价值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明代木版《长物志》,“除各卷均注雁门文震亨编、东海徐成瑞校外,并注明:卷一,太原王留定;卷二,荥阳潘之恒定;卷三,陇西李流芳定;卷四,彭城钱希言定;卷五,吴兴沈德符定;卷六,吴兴沈春泽定;卷七,天水赵宦光定;卷八,太原王留定;卷九,谯国娄坚定;卷十,京兆宋继祖定;卷十一,汝南周永年定;卷十二,兄震孟定。”<sup>[31] [P. 7]</sup>而文震亨有此见解和著作,绝不只是有此方面的知识,而是源于真实的人生和生活,更进一步,源于家族的风雅传承。“君(文震亨)家先严徵仲太史,以醇古风流,冠冕吴趋者,几满百岁,递传而家声香远,诗中之画,画中之诗,穷吴人巧心妙手,总不出君家谱牒,即余日者过子,盘礴累日,婣娟为堂,玉局为斋,令人不胜描画,则斯编常在子衣履襟带间。”<sup>[31] [P. 11]</sup>则不仅文震亨具有丰富的文人风雅生活实践,其家族艺术经验的积累也很丰厚。文震亨其兄文震孟,其父文元发,其祖文彭,其曾祖文徵明,都是文氏家族的精华人物。“明代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sup>[31] [P. 423]</sup>则文人事业固非起于一人一家,而是时代风气使然,尤以苏州为风雅之主,以文徵明为代表的文氏家族长期占据文人领袖地位。文徵明作为“长物”文学大师,其声名远超过“长物”的总其成者文震亨。拙政园落成,“征明漫仕而归,虽踪迹不同于君,而潦倒未杀,略相曹耦,顾不得一亩之宫以寄其栖逸之志,而独有羨于君,既取其园中景物悉为赋之,而复为之记。”<sup>[6] [P. 1236]</sup>文徵明为拙政园绘图三十一幅、赋诗三十一首、作记一篇,其作品与拙政园一起,成为后世深具人文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文氏家族在经济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有能力的家庭皆着手建造园林,其中不乏名作。作为著名的文化家族,文氏不但收集法书名画,还大量的为收集的、他人的、创作的书画作品题诗,其诗作为“长物”文学的一部分也在文

氏文学中占据重要部分。此外,文徵明不仅创作了许多煎茶、饮茶方面的图画和诗歌,甚至专门对茶具进行描写和歌咏。《长物志》中也写道“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sup>[31](P.31)</sup>由此可见,虽然人变时移,文氏文人之“长物”之爱,“长物”之志,却是心心相接,并无不同。另外,文氏家族的“长物”之爱好与精鉴,也影响到家族的女性。如文俶,明诗习礼,善画,是当时闻名的闺阁艺人<sup>[11]</sup>。虽然文氏家族究心专志于“长物”文学,取得很大成就,对家族带来很多的荣誉,但是“长物”毕竟消耗时间和财富的文人之事,要保证时间和充裕和财富的充足,方能从容积累经验,造成影响。文氏“长物”文学的繁荣是符合家族经济经过逐步积累而逐渐丰厚的过程的。总的来说,文氏“长物”文学可以称为文氏家族最有特征的文学现象,在此方面,也与苏州士绅阶层有着良好的互动。文氏家族的贡献同样也是苏州的,苏州也给了他们尊重与喜爱。但清兵的到来,使文氏家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治年间的伍绍棠跋《长物志》时感慨“曾几何时,而国变沧桑,向所谓‘玉躐金题’,‘奇花异卉’者,仅足供楚人一炬。”<sup>[31](P.423)</sup>“长物”本身,尤其是物质形成本身,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家族的衰落,细节上心口相传,具体而微的传承的中断,都可以使昔日的繁荣很快消失沉没。伍绍棠感慨的正是文氏家族入清衰落后,“长物”雅事再也无人振兴的状况。

文氏家族一向比较缺乏建立宗族共同体的志向,无论前代人物、领导人物以及后代人物,似乎都没有准备采取一定的方法使家族更加组织化。范仲淹在建立范氏宗族之前,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思考如何解决族中贫寒族人的生活、教育问题。王氏宗族虽然在明代并没有正式建立宗族共同体,不过王鏊的祖父已经立志,以范氏义庄为榜样建设家族,并把建立义庄的希望寄托在其子王朝用身上,此后,人们对此事念念不忘,结果在清代通过族人捐置购买土地实现了义庄建设的理想。申氏宗族起于申时行,申时行是大人物,有能力、有手段,在其生前已由贫微之族成风拥有八百亩义庄土地的宗族共同体。文氏家族虽有其人,其人却未顾及宗族建设;有其志,其志却不在经营义庄土地这种看似烦琐的事情上。文氏家族在兴盛期,族人的教育和生活未必低于宗族共同体。但宗族共同体在衰落期通过一定的管理和运行,发

挥保存种子的功能,以期在条件合适的时候重新振作,而且往往也可以重新振作,家族却缺少这种功能。当然,文氏宗族衰落之前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文震孟,可惜时在乱世之中,以及其去世较早,没有在家族中发挥出应该发挥的作用。

最后,在关键时机上。文氏家族决定命运的时机,第一是在文徵明盛名满天下之时;第二是文震孟入阁为相之际,文氏家族如果在这两个时间节点提高家族层次,是有很大的机会的。但是并没有人这样做。文氏家族还是以纳税小家庭为基础,以非必然出现的名人,通过创作与交游维持家族名声,这样的家族中,注定只是显赫家庭少、默默无闻的纳税小家庭居多,而且小家庭之间的联系日益稀少,往往感情非常淡薄,他们之中比较好的人,会顾及血缘关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但他们之中不肖的人,完全可以对家族利害视若无睹,而家族对此也没什么办法。文氏家族的第三个时机,在改朝换代之际,这个时机不是要求更高的层次了,而只需要保持本身的层次,文氏仍然没有做到。在文乘犯难被杀,家产被抄,部分寄存在亲戚家中的家产也被悉数贪没,文氏作为一个家族已日暮途穷,不可避免的衰落下去。原因在于,第一,家族之内无领袖人物。先是文震孟死,接着文震亨又死,已经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人物统一指导家族应该在乱世中如何行动。文氏家族平时也没有共同体训练,不可能制定共同行动的计划 and 纲领。而只能在各行其是中,迎接不可预知的命运。第二,在家族没有具体可行的策略以及团结一致行动的计划时,个人名声这时极有可能是负资产。抗清义兵会拉拢名家子弟,而清政府则对有号召和抵抗能力的名家子弟极其戒备,可能做任何积极的选择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第三,文氏族人的轻率和不成熟,这特别表现在文乘身上。文乘参与抗清义兵其事,极有可能是受了南明官员的欺骗,而对清政府的试探,又轻易中计,从而坐实了抗清之名,因而被杀,家产充公,同时被杀的还有另一文氏子弟。其兄文秉未被牵连,以清政府当时搜剔之严,文秉的无事足以证明对其弟之事可能真的毫不知情,而不知情就是不能团结一致的表现。遭变后的文秉做的只是隐居深山著书,兄弟间不能背负家族的责任,从此,文氏家族彻底失掉核心人物,层次降低到自然的自生自灭的小家庭。其后文氏无论族人还是文学,都不值得特别重视。

#### 四、小结

明代苏州府的文氏家族是一代名族,族中著名艺文之士蝉联数代,无论其人物、其艺能、其文学,皆灿然可观。一代明星文徵明当时名扬海内,其后名垂千古。文氏家族在苏州从一个普通的文氏赘婿开始,通过科举上的进取和数代人艺术上的努力,文氏族人不但能获得文坛领袖地位,而且有着丰富而鲜明的自身文学与艺术特征,甚至还培养出有着不错成绩的女性艺术家。但是在明清易代之际,正值兴盛的文氏家族突然快速衰落了。从宗族共同体的视阈下观察这一现象,无疑会得到很多启发。宗族共同体是家族的更高层次,文氏家族却未曾达到这一层次。未曾达到的原因,第一在于文氏主要人物本身,第二在于文氏主要人物的志向,第三在于缺少接触更高层次圈的机会,而自身格局也不太可能轻易突破。因此,文氏家族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在易代之后,缺乏领袖人物,没有共同行动的计划,不知未来的路该如何走。甚至还有人轻率地走上并非经过慎重不差商过的险路,给自己和家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显然是缺乏相关的能力所致。在利害攸关时能够保护族人的安全和利益方面,能详细筹划、灵活协调,能有过去的经验做参考,能缜密对待新情况,能团结族人共同面对的宗族共同体更胜一筹。

#### [参考文献]

- [1]李东阳.李东阳续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7.
- [2]王贻.文氏家藏诗集[A].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C]集部·总集类第11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
- [3]文徵明.文徵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文林.文温州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C]集部第4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5]文肇祉.文氏家藏诗集[M].万历十六年刻本.
- [6]文徵明.文徵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7]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 [8]林俊.见素集卷23[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文含辑.文氏族谱续集·历世第宅坊表志[M].苏州曲三石谨言庐石刻本,1929.

- [10]薛龙春.文氏家族的文化应酬、收益与策略,以文、华二氏的交往为中心[J].中国书法,2016(4).
- [11]杨昇.长洲文氏家族文学研究[D].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论文,2011.
- [12]文元发.清凉居士自序[A].明文海卷434[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徐枋.居易堂集卷十三[A].《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04-02[C].
- [14]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小序[M].光绪8年蒋氏心矩斋刻本.
- [15]文震孟.药园文集卷17[M].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
- [16]姜埰.敬亭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7]顾苓.塔影园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8]姑苏名贤后记·文氏志传增附,乙亥丛编.
- [19]朱若麟等.(崇祯)吴县志卷二十三[A].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C]第1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
- [20]汪琬.汪琬全集笺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21]姚宗典.文从简先生传[A].顾沅辑吴郡文编第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22]郑敷教.端文先生墓志铭[A].顾沅辑《吴郡文编》第5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23]文含.云岑杂著·书示侄孙绎[M].乾隆23年刻本.
- [24]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5]林希逸.竹溪斋十一稿续集卷12[M].明谢肇制小草斋抄本.
- [26]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27]王鏊.王鏊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28]文元发.清凉居士自序[A].明文海卷434[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 [30]旧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1]文震亨.长物志校注[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南山)

## Enrollment Rate and Number of Juren 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 Yingtian Prefec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PEI Jia - liang

( *Department of Social History ,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Fuzhou , Fujian , 350007 , China* )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 the average enrollment rate 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 Yingtian prefecture was 7.26% , which reached the peak in the reign of the Hongwu Emperor and the Yongle Emperor , i. e. , 23.22% . After that , the enrollment rate began to decrease , which was lower than or close to 2%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Ming government limited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taking provincial examination for four times respectively in the 21<sup>st</sup> year of the reign of the Chenghua Emperor , in the reign of the Zhengde Emperor and the Jiajing Emperor. However , such a system was implemented only for a short time , and was soon defied du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andidates , which shows a growing difficulty to obtain the fame of Juren ( a qualified graduate who passed the triennial provincial exam) in Yingtian prefecture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Yingtian prefecture and surrounding areas , the place with the largest amount of enrolled candidates 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 there were at least 12246 candidates admitted to be Juren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Yingtian prefecture; enrollment rate; number of Juren

## Keys to Success of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Philosophy

—Based on Mencius's Moral Philosophy

HAN Xu

( *Bo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 BoZhou , Anhui , 236800 , China* )

**Abstract:**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has a deep effect on the land of China for over 2 000 years , each area , combined with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 forming different styles and features. Huizhou , with it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al customs , perfectly integrates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oughts , which makes Huizhou merchants successful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for more than 300 years. On the one hand ,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unique environment of Huizhou , the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on the other ,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izhou merchants' business ideas such as valuing justice above material gains , devoting themselves to helping others ,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honesty. All these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Huizhou merchants.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Huizhou merchants; Mencius; moral philosophy

## Wen Family in Suzhou Prefecture and Its Rises and Falls i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n

LIU Zhi - qia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234 , China* )

**Abstract:** Wen family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a distinguished cultural family represented by Wen Zhengming , famous for its numerous talented person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 each generation. The offspring of Wen family inherited the forefathers' aspirations , edited poem anthology and genealogy and even cultivated the most successful talen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 Zhuangyuan Wen Zhenmeng. However , Wen family declined rapidly during the changing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 although it should have been more prosperous.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lan , Wen family never comple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family organization , and thus lacked the strength to resist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times. Besides , their character of literati made them easily take a risk on impulse when making critical choices , which actually brought a fatal blow to the family. While other well - organized families with more experience in facing disasters are able to cope with difficulties and minimize losses to preserve the strength for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family and family culture.

**Key words:** Wen family; Wen Zhengming; Wen Zhenmeng; community

## Coexistence of Various Literary Forms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XIAO Yao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Yangzhou College , Yangzhou , Jiangsu , 225100 , China* )

**Abstract:** The novel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s grand and profound. Cao xueqin , the author of the novel , has a good command of various literary forms such as poems , songs , memorial essays , couplets , Buddhist's chant , letters , lantern riddles and drinking game verses ,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ng literary characters , developing the plot of stories and revealing the theme and greatly improves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novel. After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the phenomenon that various literary forms coexist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 the cultur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the author's cultural literacy can be found out , and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n the Chinese novel history can be revealed.

**Key word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arious literary forms; Cao Xueqin